

# 民国时期徽州乡村医者的医事活动、行医范围与日常生活 ——以《民国婺源医家日记》为中心

赵士第<sup>1</sup> 叶鹏<sup>2</sup>

(1.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新见《民国婺源医家日记》提供了一位婺源乡村医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日常生活轨迹。通过对《日记》的细致研读,发现乡村医生的行医范围基本局限于长轴约20km、短轴约10km的椭圆形区域内,而核心区域则为长轴约12km、短轴约7km的小椭圆。乡村医者诊治项目多,具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其日常生活除行医治病,还多有读书、吃茶、看戏等娱乐活动,所涉范围亦局限在医者家乡周边。《日记》展示的乡村医者行医圈比较狭小,但通过比对,可以发现其与婚姻圈、市场圈、交友圈均有重合。即便到了民国中叶,乡村医者的行医轨迹大多仍然遵循传统脉络,人情、道义在行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虽受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影响,但始终未能形成专业化、职业化的行医模式。

**【关键词】**日记;徽州;医者;日常生活;医疗范围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2-0103-13

## Medical Activities, Practice Scope and Daily Life of a Rural Doctor in Hui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Wuyuan Doctor's Diary in Republic of China

ZHAO Shi-di<sup>1</sup> YE Peng<sup>2</sup>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2.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e newly published diary of a Wuyuan doctor provides his daily life track in the late 1920s. Through careful study of diary, the paper find that the practice scope of the rural doctor was basically limited to the oval area with a long axis of about 20km and a short axis of about 10km, while the core area was a small ellipse with a long axis of about 12km and a short axis of about 7km. This rural doctor had many projects of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rich medical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o practicing medicine, he also had many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reading, drinking tea, going to the theater, but the scope involved was limited to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his hometown. The practice circle of rural doctors shown in diary was relatively narrow, however, through comparison, we can find that it overlaps with marriage circle, market circle and sacrifice circle. Even in the midd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st of the rural doctors still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path of medical practice, in which human relationship and morali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Even with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medical knowledge, they failed to form a professional medical practice mode.

**Key words:** diary; Huizhou; doctor; daily life; practice scope

[收稿日期] 2020-1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与现代‘西医’的形成研究”(18ZDA175)

[作者简介] 赵士第(1994-),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叶鹏(1995-),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政治地理、文化地理。

近年来,国内社会史学界出现了新一轮研究范式更新,吸收了英国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意大利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德国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等学派之精华,逐渐开始关注社会生活的细微之处,发掘国家制度、地域文化、社会关系与个人生活的互动<sup>①</sup>。

受资料所限,以往学者多以知识群体为讨论对象,很难复现底层民众的生活实态。本世纪初,排日账这一类独特史料被学界所知,研究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遂成为可能。刘永华释“排日账”之意为:“所谓‘排日’,应是指这种文献的逐日记录的书写格式,而‘账’是指它记录了日常的收入和开销,与账簿类同”<sup>②</sup>。目前学界关于排日账的研究有极强的史料导向,多基于某份新见资料做个案例分析,研究对象集中于农民、学生、塾师、局董等群体,对其活动空间、日常生活与经济收支等问题有细致讨论<sup>③</sup>。但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有对乡村社会其他人群排日账的精彩解读,医家排日账则更属少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是古今医者日记(排日账)本身颇难寻觅,虽有前辈在徽州零星发现如《诊医日记》《宋氏日记》等资料<sup>④</sup>,但因藏诸私人,其内容不得而知。

医者日记(排日账)对研究医疗社会史和医者日常生活史的价值不言而喻,杨奕望等中医学者曾指出日记史料对中医学术研究能提供重要参考<sup>⑤</sup>,但其所用皆为官员日记,难免隔靴搔痒。近年王剑辉主编的《珍稀中医稿钞本丛刊·新安卷》卷十二中有《民国婺源医家日记》(以下简称《日记》)<sup>⑥</sup>一册,内容较丰富,但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sup>⑦</sup>。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份资料的精细解读,考察民国时期徽州乡村医者的行医范围与日常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尽力还原当时当地乡民世界的具体样貌,以供参考。

① 参见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3月31日(第7版);刘永华:《在旧民俗中发现日常生活史——辛德勒〈近代早期德国的造反、社区与习俗〉评介》,《人文国际》第5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5-249页;张立程:《从微观史、日常生活史到社会文化史》,《河北学刊》2017年第2期。眼光向下和走向细节并非社会史领域的“专利”,近来,重视“日常”也为政治史领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得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关于农民日常反抗(Ever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的启发,提出了日常政治(Everday Politics)的概念;侯旭东则从政治治理角度,发明了“日常统治”的提法。见(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美)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钟逸明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② 刘永华:《排日账与19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研究——兼谈明清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史料》,《学术月刊》2018年第4期。

③ 代表成果可参见邵鸿、黄志繁:《19世纪40年代徽州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介绍一份小农家庭生活活动日记簿》,《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通讯》第27期,2002年;黄志繁、邵鸿:《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参见王振忠:《明清以来的徽州日记及其学术价值》,载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振忠:《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2年第1期;刘永华:《从“排日账”看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徐俊嵩、郝晓丽:《民国年间徽州小农家庭的日常生活管窥——以1929年王福祥所立流水〈日就月将〉为中心》,《农业考古》2016年第1期;董乾坤:《徽州民间账簿及其产生的社会机制——以“胡廷卿账簿”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董乾坤:《社会关系与日常经济网络的形成——以胡廷卿家庭收支账簿为中心》,《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康健:《晚清徽州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以〈局董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20年第5期等。按:家庭收支账簿、家庭流水账等与“排日账”相似,因此归为一类。

④ 参见王振忠:《明清以来的徽州日记及其学术价值》,载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6页。

⑤ 杨奕望等:《浅析日记史料与中医学术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年第8期。

⑥ 王剑辉主编:《珍稀中医稿钞本丛刊·新安卷》卷十二《民国婺源医家日记》,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日记》,版本亦不一一注明。

⑦ 仅有许仕海:《〈珍稀中医稿钞本丛刊·新安卷〉医著选评》,《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年第3期,有些许简要介绍。

一、《民国婺源医家日记》资料概述

排日账多见于婺源,这似乎与该地风俗有关。清代婺源人詹鸣铎的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中载:“又记得父亲教我记排日账‘母亲采猪草,娘娘背姆。’”<sup>①</sup>记排日账可能是当地蒙童习字的一种手段,至成年后仍有不少人保留了这一习惯。医者的排日账较为难见,现对《日记》的书写格式、内容、作者身份及家庭信息等,作如下阐述:

(一)书写格式及内容

《民国婺源医家日记》原无题名,现名乃丛书编者在整理时所加。《日记》共104页,一万多字,所记时间自民国十六年正月初一(1927年2月2日)至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三十除夕(1929年2月9日),共记录了医者731天的活动,其中民国十六年347天,正月十六日缺;民国十七年,因闰二月多29天,共有384天之多,具体天数可见表1。该资料虽名曰日记,但内容与排日账无异,主要记载了一位婺源乡村医者的诊疗、读书、交往、祭祀、日常开销、娱乐等活动。

全书格式较整齐,先书日期,后写天气、地点、每日活动、日常收支等,书体工整,以行楷字体居多,体现了其较为深厚的书法造诣。这里我们不妨举民国十六年正月初七到十三日的书写记录为例:

初七。晴。癸酉。同新印弟往瑶村坦考水拜年。宿考水。

初八。晴。甲戌。在考水,到景云光店内嬉,承接食夜饭。与焕章先着棋。并来牙痛水一缸,扣洋九分。

初九。晴。乙亥。由考水同岳父汝科回家,遇上堡姚炽代双岭李家旺伪春温托诊。父亲往罗家庄诊,故命予往诊。申刻抵双岭,其病十分危险。同姚炽往上堡拜年,遇考水植三舅立光之令郎柄伪二缮书拜年,同食夜饭。孔村一人与恒丰布店二人因票不通,退回亦在此食室。

初十。晴。丙子。在上堡往双岭复诊李旺伪,稍效。室上堡同新保叔卧。补记:初九已诊仁村胡登原之妻三阴症。

十一。晴。丁丑。由上堡□兴丁来,予乘马到家。午刻今日上午已诊观保寒邪。

十二。雨。戊寅。在家读书。姚炽代李旺伪来改方,父亲改之。

十三。雨。己卯。在家读书。昨今两日因伤寒服药二剂。<sup>②</sup>

表1 《日记》中每月天数统计

年份	月(农历)	日(农历)	天数	年份	月(农历)	日(农历)	天数
1927	正月	初五—三十	23	1928	正月	初一—廿九	29
	二月	初一—廿九	29		二月	初一—三十	30
	三月	初一—廿九	29		闰二月	初一—廿九	29
	四月	初一—三十	30		三月	初一—廿九	29
	五月	初一—廿九	29		四月	初一—三十	30
	六月	初一—三十	30		五月	初一—廿九	29
	七月	初一—廿九	29		六月	初一—廿九	29
	八月	初一—三十	30		七月	初一—三十	30
	九月	初一—廿九	29		八月	初一—廿九	29

① [清]詹鸣铎,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我之小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② 《日记》,第498页。

续表1

十月	初一—三十	30	九月	初一—三十	30
十一月	初一—三十	30	十月	初一—三十	30
十二月	初一—廿九	29	十一月	初一—三十	30
			十二月	初一—三十	30

可见,《日记》除简单记录时间、天气等要素外,诊疗、社交等活动乃记录重点。从用语上看,《日记》也颇具徽州特色,运用了不少徽州方言词句,如喝酒称“吃酒”、买药称“点药”、玩耍称“嬉”、睡觉称“卧”、肺病称为“虚症”、生子称为“添丁”,同时,习惯在人名后加“仵”等,都是当地方言俗语的鲜明表现<sup>①</sup>。

## (二)作者家庭信息及身份

本书作者姓名、生平已难查考,编者推测应是婺源北乡思口一带人士<sup>②</sup>,出身医学世家,父亲便是当地医者,父子医术相传,是颇富名气的乡村医者家族<sup>③</sup>。在徽州,有不少著名医学世家传承下来,徽州医学(新安医学)名满天下与自宋代起便趋于兴盛的家族组织不无关系<sup>④</sup>。未载者显然更多。《日记》中记录了作者的家庭情况,涉及父母、岳父母、叔公、舅舅、舅祖、舅祖母、表兄弟、表嫂、太岳母等亲属,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健康状况均有提及。但未见有提及妻儿,很可能作者新婚燕尔,尚无子嗣。不提妻子的情况或与排日账的传统写法有关,黄志繁等通过阅读五本排日账分析认为:“女性在排日账中并非记载重心,而是居于次要地位”<sup>⑤</sup>,再者,排日账本质上是私人记录,一般只关注社会关系网中的其他节点,作者同妻子组建家庭,形成社会基本单位,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并不涉及社会交往,因而对妻子只字不提也在情理之中。

必须注意的是,作者并非普通的乡村草泽铃医,而是有文化素养的居乡儒医<sup>⑥</sup>。除研习医书外,他还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儒家经典,还为乡民撰写讼词、调解乡里矛盾<sup>⑦</sup>。这与徽州医者“医而好儒、医名儒行”的传统风气有关。明人邵辅曾言“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sup>⑧</sup>,可见儒、医所习有部分相通甚至相合的。大量科举不售的士子弃儒就医,由于文化修养高,对医理理解独到,很受民众欢迎,这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晚清并不罕见<sup>⑨</sup>。张玉才、徐谦德指出,徽州地区自宋代至清有记载的医家及通医者近800人,认为:“由士、儒而习医者占70%,即使30%继承家传的专科医生,受文化环境的熏陶,都能发奋读书。因此,新安医家学派逐渐形成‘好儒’习俗,具有典型的儒家传统。”<sup>⑩</sup>

传统时代,除医官及有身份的儒医外,普通医者常被当作方技看待,甚至在清代从医为人唾弃,医者的社会地位不高,“庸医”“良医”形象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不相上下<sup>⑪</sup>。从《日记》中看,乡村医者地位较

① 婺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婺源县志》第三十二篇《方言》,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559-568页。

② 《日记·提要》,第496页。

③ 在《日记》中有许多父亲指导作者行医改方的例子,同时也记载了父亲出诊的情况。如《日记》第498页记载:(民国十六年正月)十二。姚炽代李旺初来改方,父亲改之。第499页载:戊刻,有清华胡养元患病,托胡嘉班先其函,托父亲诊。

④ 童光东:《论新安医家家族链是新安医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⑤ 黄志繁、邵鸿:《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⑥ “儒医”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在传统时代一般指有功名而行医之人。在清末科举废除后,一般研习儒家经典、践行儒家道德规范的医者亦可以称为“儒医”。

⑦ 《日记》第553页记录了作者同叔父处罚乡人王贤荣等砍竹子破坏山林一事;第554页记载了作者为调解宗族间的矛盾抄写讼词。

⑧ [明]邵辅:《重刊〈儒门事亲〉序》,载于《张子和医学全书》,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5页。

⑨ 周启荣:《医治公众:清代士商社会的公共文化与慈善医疗服务》,载于余新忠主编:《新史学》第九卷,中华书局,2017年,第21页。

⑩ 张玉才、徐谦德:《新安医学的儒学传统》,《上海中医药杂志》1998年第7期。

⑪ 杜家骥主编:《清代基层社会关系研究》第七章《医病关系》,岳麓书社,2015年,第321页。



高,这与传统时代有着明显区别。晚清以前,大量医者在城内坐诊,乡村医者数量很少,而进入20世纪以后,乡村医疗资源得到发展,一些医者儒、医兼通,不啻为一乡绅,在基层社会亦占有一席之地。乡民对该医颇为尊敬,请诊时用轿子配轿夫来接,如民国十六年闰二月初九,“托诊,从考水乘伏到坞口,半夜时刻诊其病”<sup>①</sup>;诊回后患者家属还要送其回家,如民国十七年一月十三,约诊至程家,“亥刻受当二人送予抵里。”<sup>②</sup>另外,逢年过节,乡民还会送猪蹄、鱼、鸡蛋等礼物去医者家表示敬意,如“中门王贤生送蹄包一双四斤”“中门王吉纯送蹄包三斤”“下高仓潘瑞明送鲜鱼、鸡蛋三十枚”<sup>③</sup>。作者行医诊费较低,有时甚至免费出诊,这些礼物显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交换,可以被当做是为维持低诊费而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的具体手段,因此医者在乡里具有较高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日记》所见徽州乡村医者的医事活动及行医范围

日记、排日账等资料,是执笔者日常生活的切实记录,利用这些文本我们可以复原出相关人物在乡村中的具体生活轨迹,搭建出记录者及其家庭的活动空间,描摹其所在地域社会的具体面貌<sup>④</sup>,刘永华指出:排日账牵涉的社会主体不是中观共同体,而是家庭(更准确地说,是排日账的记录者),它提供了从家庭(或记录者)的角度观察乡村社会生活的视角,使我们得以理解不同的社会组织、人际关系,在以某一特定个人或家庭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中,究竟具有何种重要性。”<sup>⑤</sup>本研究利用的《日记》所载内容多是作者行医活动及患者身份信息、所患疾病等,可借此判断其医事活动及大致行医范围,从而展现乡村医者的诊疗实态。

(一)医事活动

医者所治疾病皆有特色专长,医术专精者被称为“专科医者”。在徽州如著名的西园喉科、梅林妇科、吴山铺伤科、黟县碧山李氏内科等,皆属此类。徽州医学分科可谓一大特色<sup>⑥</sup>,但在乡村地区医疗资源有限,专科医者并不多见,类似新中国成立后的“赤脚医生”,在乡村备受欢迎。我们在婺源乡村中可以发现不少全科医者的身影,如婺源江湾村江启厚作为一名中医师,兼顾外伤、内伤和妇科,实际已成为全科医师<sup>⑦</sup>。从《日记》来看,作者亦是一名全科医者,在内科、外科、男科、妇科、儿科等领域都有治验,这也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民的日常医疗需求。我们可以根据《日记》,将1927年中作者所诊疗疾病做一统计(见表2)。

表2 《日记》所见民国十六年(1927)医者诊疗疾病类型

疾病	春温	感寒 发热	时邪	咳嗽	妇科	伤寒	头痛	胃肠 疾病	儿科	浮肿	腹痛	牙痛	便秘	男科	失血	温病	虚寒
次数	5	18	24	17	4	3	2	7	3	1	10	1	3	1	2	4	1

资料来源:据《日记》,第497-546页统计。注:本表将同一疾病的复诊等多次诊疗合并为一次。

①《日记》,第556页。  
②《日记》,第503页。  
③《日记》,第503、516、515页。  
④参见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乡村地主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张桦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洪璞:《乡居·镇居·城居——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刘永华:《从“排日账”看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历史研究》2014年第5期  
⑤刘永华:《排日账与19世纪徽州乡村社会研究——兼谈明清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史料》,《学术月刊》2018年第4期。  
⑥张玉才:《新安医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⑦卜永坚、毕新丁编:《婺源的宗族、经济与民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4页。

就诊病次数来看,作者以诊治时邪、感寒发热、腹痛、便秘等日常疾病为主。从诊疗手段来看,诊治时不仅只用中医,还结合巫术、西医等手段:如灶生弟患腹痛服药不见效,只能到天灯底“叫吓”<sup>①</sup>,再结合中医治疗,以获疗效<sup>②</sup>;又如作者友人细长久咳不愈,便去江村托人买美利坚药(西药)来治<sup>③</sup>。这说明了乡村医者诊病方式多样,在医疗资源匮乏的背景下,为达治病目的,并不拘泥自身所学,而是多管齐下,体现该医者疗病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

乡村社会中,患者多采用托函请医之法,以示对医者的尊敬,这也是徽州地区的风俗,我们在《日记》中不难发现类似记载。现存的清代婺源日用书《应酬便览》中亦有请医帖的写法,可见一斑,兹选录如下:

△处△先生,医宗扁鹊,卜筮灵龟。上药、中药、下药,虽尝备于囊中;五色、五气、五声,不易德其怀抱。予以险症访知先生,先生乃代按其阴阳,卜其凶吉,不特膏肓[育]应药,而且决断如神。近以训蒙,潜居里内。倘有染病求医,用方、点药,或减或加,既从其便;价轻价重,亦得其宜。凡我近村,不必往诸△处之遥,只须问以△△书屋矣。谨白。<sup>④</sup>

从患者的年龄来看,覆盖各年龄阶段,有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儿童。而患者身份则有茶馆老板、饭店店主、糕点铺老板、裁缝、铁匠、木匠、农民、雇工等。基本覆盖了乡村生活中能够涉及的大多数社会关系。作者将诊疗结果是否有效也清晰记录下来,毫不避讳,一般分为“无效(不效)”“稍效”“效”三种程度,如“(三月)廿四,在考川复诊桂凤娘,稍效”<sup>⑤</sup>;“(四月)初二,往杨坑,诊岩树时邪发叻,难治。……初三。复诊岩树无效”<sup>⑥</sup>;“(五月)十四,在家复诊三叔公,效”<sup>⑦</sup>等。

民国时期医患关系往往较为紧张,且医讼盛行,医者经常成为报纸报道的焦点<sup>⑧</sup>,此医者在行医时较为谨慎,《日记》中有多处医者无奈诊治的记录,体现其谨慎的态度。当患者病危时,不愿开方,害怕承担责任。如某次“由城到高沙复诊茂枝之脉象弱极、内弦软症实难措手,告辞,另请高明”,十一月初六自己表弟“病倒邑中,托余往诊”,因重症不愿出,但“余因是至戚,故难辞却”<sup>⑨</sup>。由于该医者行医谨慎,并无医患冲突出现。

《日记》中对其他医事活动的记录,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如择医问题,体现了患者在求医过程中的权力。《日记》中载:“程之子发热咳嗽。焕章(按:当地一位名医)诊过数次,因补温药太过,致发痼疾。”<sup>⑩</sup>在胡焕章诊治数次无效后,便更换医者来诊。医者共同会诊,是保障患者权利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医者争夺治疗权的策略<sup>⑪</sup>。如三月廿四,“下午偕植三舅往考川诊允端夫人桂凤咳嗽。”<sup>⑫</sup>便是医者间相互配合的范例。

① “叫吓驱病”在徽州农村很常见,类似于一种巫术,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很流行,一般年龄大的妇女、半农半医者皆会此术,此据安徽师范大学康健先生提示,特此谢忱!

② 《日记》,第526-527页。

③ 《日记》,第530页。

④ 参见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同载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⑤ 《日记》,第508页。

⑥ 《日记》,第509页。

⑦ 《日记》,第569页。

⑧ 参见马金生:《发现医病纠纷 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⑨ 《日记》,第589页。

⑩ 《日记》,第508页。

⑪ 参见张田生:《清代医家对治疗决定权的争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5年第16期。

⑫ 《日记》,第508页。

再如用药问题,《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两年间历次诊疗的用药情况和药品来源。徽州是著名的药材产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春秋短,夏冬长;热量丰富,雨水充沛……光能资源偏少,日照时数和日照百分率偏低;云雾多,湿度大;夏洪秋旱,低温寒潮”<sup>①</sup>,这种环境有利于中药材生长。民国《重修婺源县志》记载的物产中,所产药材达71种之多<sup>②</sup>。但其时婺源全境药店数量有限,民国三十六年(1947)医药登记,全县药店仅15家<sup>③</sup>,而民国初可能更少。乡村医者的药品部分自备、部分采买,如民国十七年三月廿四、廿五两天在家筛选上山所采的苦马(按:用于清热解毒、活血)这一中药<sup>④</sup>,十九、廿日在家拾柏子(按:用于治疗血亏)等<sup>⑤</sup>。由于个人精力和能力限制,大部分药材需要采买,如民国十六年三月“廿六……来店买药,洋三十正”<sup>⑥</sup>。有些难买的药品则需要托人代买,如“以洋十元托买高丽参”“在家诊三叔父寒邪,托点药便带上函奉岳父托裁缝”<sup>⑦</sup>“下午印药方托人”<sup>⑧</sup>等。

除为患者诊病外,作者还曾为自己医治。这在明清、民国时期刊刻的医案及医著中十分少见,如“(正月)十三,雨。在家读书。昨今两日因伤寒服药二剂”<sup>⑨</sup>;再如民国十七年二月十一到十八,作者喉痛,服用自己配制的六神丸,却不见效,影响了正常生活<sup>⑩</sup>。医者自医是对自身医疗水平的检验,同时也刺激了医者产生自我矛盾的心理,如八月廿三“在家寒热大作,成重症”一直持续到廿九。服药不见效后,决定“九月初一往朝云斋进香”<sup>⑪</sup>。医者在医药不灵的情况下,也只能求助于神灵驱病。

(二)行医范围

除居家坐诊外,很多医者大量时间是出诊的,因此我们不可避免要讨论医者的行医范围。在传统时代,医者所留医案中有一些出诊地点的记录,可以大致描述医者的行医范围。如前辈学者萧国钢利用金代医者张子和所著《儒门事亲》中的记载,提出张子和行医范围是“以子和侨居地陈州为圆心,北到开封、南至息县,西达舞阳,东及亳县的一块圆周地域。”<sup>⑫</sup>但医案本身有着较大局限性,医案多载开方和治验效果,对出诊地域描述较模糊,难以计算准确的范围面积。医者《日记》(排日账)将每日出诊地点详加记录,这便为复原其行医范围提供了可能。据《日记》中所载患者方位,可将出诊地点、频次列表(见表3)。据该表,结合婺源县地图、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及《婺源县地名录》可绘成简略的示意图,用以表现医者的行医范围(见图1)。

表3		1927—1929年内731天出诊地点及频次							
地点	频次	地点	频次	地点	频次	地点	频次	地点	频次
考川	33	桃源	5	新源	2	江村	1	南乡王坑	1
瑶村坦	24	杨坑	10	老源	2	龙头山	1	黄落坦	1
仁村	21	郑坑	4	长滩	2	南谷	1	岑下	1
中门	19	婺源城	4	西乡西坑	3	黄岩岭	1	上门	1

① 何警吾主编:《徽州地区简志》,黄山书社,1989年,第64页。

② 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五·物产》统计。

③ 婺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婺源县志》第十八篇《科技 卫生》,第460页。

④ 《日记》,第563页。

⑤ 《日记》,第535页。

⑥ 《日记》,第508页。

⑦ 《日记》,第569页。

⑧ 《日记》,第592页。

⑨ 《日记》,第498页。

⑩ 《日记》,第552—553页。

⑪ 《日记》,第528页。

⑫ 萧国钢:《儒门事亲研究》,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页。

续表3

玉坦	15	上源江	4	延村	2	新岭	1	玉岑	1
下门	15	樟村	4	西乡对坞	2	西乡冲田	1	塘坞口	1
上坑	14	西冲	3	南乡武口	2	南罗田	1	螺蛳坑	1
上堡	13	永和亭	3	西乡游汀	2	曹坑	1	汪小	1
下高仓	9	金竹	3	双岑	2	银峰	1	十宝	1
高沙	8	双岭	3	罗家碛	2	王村	1	溪口	1
下市顾	8	清华	2	江头山	2	孔村	1	朝云斋	1
思溪	6	黄星堂	2	前源罗	2	南乡东坑	2	花桥	1
汪村	5	读屋泉(前)	2	岑鸦圩	2	南乡齐村	1	月下楼	1

资料来源:《日记》,第498-5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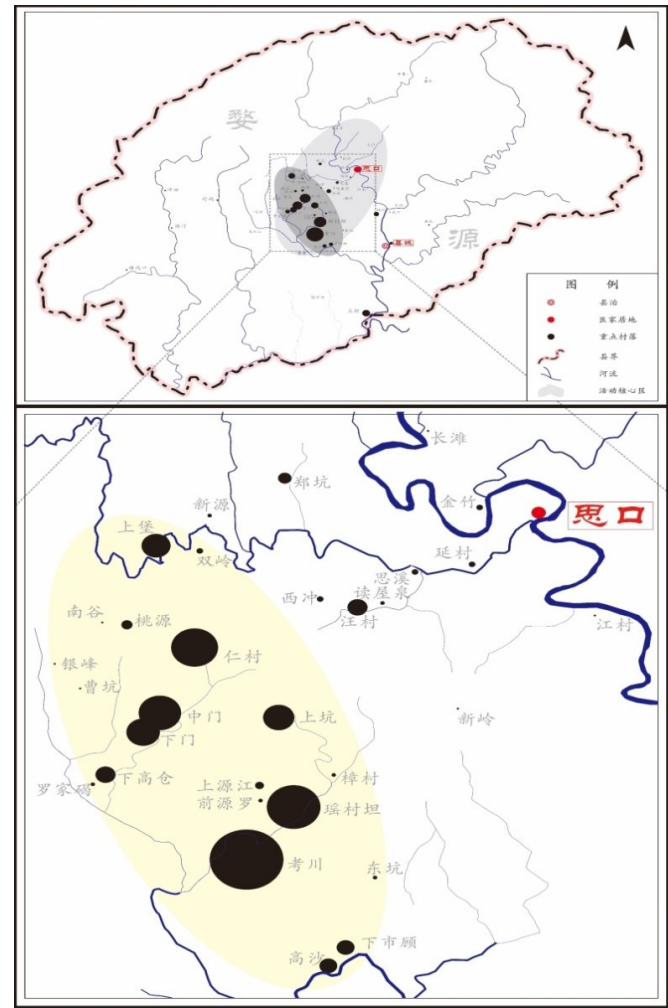


图1 民国婺源乡村医者行医范围示意图

观察图1,不难发现医者以家乡思口为中心,其行医范围基本局限于长轴约20km,短轴约10km的椭圆形区域内,核心行医区域则为长轴约12km,短轴约7km的椭圆形。而在此区域内,又表现出了明显的集聚性特征,如在考川、瑶村坦、仁村等地,诊疗次数达20~30次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村落较大,人口密集;更重要的是,医者亲属关系多与这些村落有密切联系。如考川是医者的岳父家,医者常登门探望,通过岳父的关系收获了许多患者资源。瑶村坦是医者母亲的家乡,在当地有许多舅舅辈的亲人和儿时的玩伴,为其医名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再如仁村是区域内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村落,此地常上演目连戏、徽剧,医者喜好看戏,在此结识众多戏友,且此地乡村市场发达,医者经常需要前去采买生活用品,商品中心具有较大的人流往来,使得医者在仁村也能为来此经营谋生的外地人诊治疾病。可见,医者的行医范围和姻亲关系、乡村市场范围是相重合的。另外,从表3中可以看出医者曾四次进婺源城诊病,但患者是其好友朱文杰,可见医者名气未能在县域一级产生较大影响,这也证明了乡村医者治疗范围狭窄、医名难播的局限。

三、《日记》所见医者的日常生活图景

伴随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以微观视角反映和体察个人日常生活,以此窥探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与文化意义,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sup>①</sup>。常建华先生指出:“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史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sup>②</sup>。医者《日记》清晰展现了其日常生活及所处时代中的乡村图景。从日常活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阅读活动

“医而好儒”是徽州医者的重要特征,读书乃医者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可将作者读书的时间按照月份整理如下,基本上反映了作者的阅读经历(表4)。

表4		《日记》中作者阅读活动天数统计 <sup>③</sup>		
年	月	日	天数	备注
1927	1	初六、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至廿九	16	读书
	2	初一、初五、初六、初七、十一、十九、廿一至廿九	15	读书
	3	十四、十五、十六、十九、廿日、廿二、廿三、廿七	8	抄《广瘟疫论》
	4	初一、十六至二十、廿三至廿七	11	
	5	廿日、廿一、廿二、廿五至廿九、	8	
	6	初一至初五、十三至十九、廿一、廿四、廿五、廿六	16	
	7	初一、三、四、六、八、初十至十三、十四至廿日、廿三、廿五至廿八	19	
	8	初二、初四至初九、十二	8	
	9	十八至廿四、廿九	8	
	10	初六、十一、十四、十七、十八	5	抄《广瘟疫论》
	11	初八至十一、十六、十八至廿七、三十	16	抄《广瘟疫论》,夜温习医书
	12	初三、初四、初七、初十至十三、十五至十七、十九、廿五、廿七	13	抄《广瘟疫论》,读《四书》
1928	1	廿三、廿四、廿七、廿九	4	读书
—	2	初一、初七至初十、廿日至三十	16	读《广瘟疫论》
1929	2	初一至初四、初七、初八、廿一、廿八、廿九	9	读书
	3	初一	1	写对联
	4	初五至初十、十四至十八、廿一、廿二、廿四、廿五	15	读书
	5	十七、十八、廿一、廿三、廿四、廿七至廿九	8	读书
	6	初二、十四、十七、十八、廿三	5	读《医门八法》《医宗必读》《广瘟疫论》
	7	初五、初六、十二、十四至廿日、廿三、廿五至三十	17	
	8	初五、十二、廿二、廿三、廿五至廿九	9	
	9	无	0	
	10	初九、十三、十八至廿日、廿六、廿八	7	写对联、读《三国志》《广瘟疫论》
	11	初三、初四、廿四至廿八	7	《广瘟疫论》
	12	初六至十四、廿五	10	写对联、读书
合计		251		

资料来源:《日记》,第497-600页。

从时间看,医者有251天的阅读活动,占日记所记总天数的34%,是除行医外花费时间最多的活动,可谓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环。阅读内容看,医者对医家经典《广瘟疫论》《医门八法》《医宗必读》《四诊抉微》研究颇深,其中《医门八法》是晚清儒医刘鸿恩所著,专论八纲及外感杂症诊治用药,有很高的参考

① 戴建兵、张志永:《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  
② 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③ 注:《日记》中的年份、月份及日皆为农历记录,此表转换为公历纪年方式。

价值<sup>①</sup>；《医宗必读》是明代名医李中梓的名著，乃从医入门的重要参考书；《四诊抉微》为清代林之翰所编著名诊断学著作。而《广瘟疫论》为清代戴天章所著，是对明代温病学家吴又可《瘟疫论》的修订补充，乃治疗伤寒、外感等时邪的著名理论著作<sup>②</sup>。该医者自民国十六年九月十八开始抄录该书，十二月十五完成，历时三个月抄完，并在民国十七年二月初十至八月二十八，间断历时半年读完抄本，可见医者用功之深。同时在表2中可以看出，医者所治验的疾病，也多是外感伤寒、时邪等，与所读之书的治疗经验几乎可以一一对应。

除医书外，医者还阅读了儒家经典《四书》<sup>③</sup>，史书《三国志》<sup>④</sup>，甚至参与撰写对联等文学活动<sup>⑤</sup>。日记中作者的阅读经历是“徽州出儒医”的绝佳印证。

## (二)娱乐、祭祀、宗教活动

娱乐活动是医者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记》中所载娱乐活动主要有饮茶、看戏、与朋友交谈、打猎等。以下分别叙述之。

婺源是中国有名的茶乡，饮茶之风盛行，如作者在民国十六年六月初七至初九，三天在玉坦合兴店、永兴店饮茶<sup>⑥</sup>、“廿三……在高沙饮茶”<sup>⑦</sup>、十一月“上堡饮茶”<sup>⑧</sup>、五月“在胡达文处饮茶”<sup>⑨</sup>等。饮茶除娱乐之外，更是一种社交方式，且几处饮茶地也在医者诊疗范围内。

看戏是医者重要的娱乐活动。婺源当地戏剧兴盛，主要有目连戏、徽剧等，在乡间经久不衰。目连戏自明清至20世纪40年代一直在婺源乡间兴盛，听者众多，演出时间在冬闲及秋社日，一般在祠堂中演出，时间持续五至七天<sup>⑩</sup>。徽剧起源于明末清初，在婺源也有很悠久的历史<sup>⑪</sup>。医者常去看戏的地方有瑶村坦、西冲、仁村、考川、上坑、樟村等处，观看剧目有《大香山》《二度梅》《劝善文》等，作者痴迷于戏剧，曾连续五天看戏不休<sup>⑫</sup>。

与朋友交谈也是医者的娱乐活动之一。《日记》中提及作者两位重要朋友，即胡焕章、叶景云。胡焕章是民国时期婺源名医<sup>⑬</sup>，其生平不详，仅就目前材料可知，胡氏解放后曾在安徽省卫生防疫站工作<sup>⑭</sup>。医者与胡氏不仅一起游玩，还时常讨论医学，如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三十“在考水与焕章叙谈”<sup>⑮</sup>；叶景云则是婺源考水药房的店主，作者常去店内与其畅谈，且在此吃晚饭，并和胡焕章一起在店内下棋<sup>⑯</sup>。交友与医者本身职业有关，通过与其他医者、药店主的关系网，既能够传播医名，也方便获得更多的患者资源。

婺源多山地丘陵，野兽颇多<sup>⑰</sup>，有利于打猎。打猎是医者的爱好之一，在《日记》中称为“打铳”，如“与

① [清]刘鸿恩撰，刘道清、翟明义校注：《医门八法校注》，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② 裘沛然主编：《中国医籍大辞典 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704页。

③ 《日记》，第544-545页。

④ 《日记》，第591页。

⑤ 《日记》，第558页。

⑥ 《日记》，第517页。

⑦ 《日记》，第535页。

⑧ 《日记》，第540页。

⑨ 《日记》，第568页。

⑩ 参见卜永坚、毕新丁编：《婺源的宗族、经济与民俗》，第163-164页。

⑪ 潘秋江：《浅谈婺源徽剧》，《婺源文史资料》第4辑，1993年。

⑫ 《日记》，第558-559页。

⑬ 《日记·提要》，第496页。

⑭ 胡焕章：《学习祖国医学的几点体会》，《中级医刊》1955年。

⑮ 《日记》，第596页。

⑯ 《日记》，第498页。

⑰ 参见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五·物产》。

鹤勋等人在下高打铳,得一鹿十一斤,送予二斤半。”<sup>①</sup>作者经常带火铳去找朋友进山打猎,“带铳去俞起云兄弟、灶起、同予去面前山逐出一麋未打铳”<sup>②</sup>。当然有时也无获而归,如十月十一“与旺丛、根富打铳,未获”<sup>③</sup>。

除娱乐活动外,祭祀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宗族观念很强,徽人又尤为重视清明节,清人程且硕在《春帆纪程》中说:“清明节,新安最重此节,凡子孙虽至贫乏,亦必先半月前具牲饔、肃衣冠,相聚拜于始祖之墓,而后高、曾、考次第展拜,罔敢紊淆。”<sup>④</sup>《日记》中作者在清明的前两天便托人去思口购买相应物品,三月初一至初七,七天做清明,要扫墓、挂纸、还要写祭文用以怀念祖先<sup>⑤</sup>。

除祭祀外,医者还参加了不少宗教活动。儒、释、道教在徽州民间兴盛,且民间信仰众多,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sup>⑥</sup>。如每年二月初要祭拜文昌帝君,还要写祭文以示尊敬<sup>⑦</sup>;八月赴朝云斋进香,拜玄天上帝(真武帝),出发前需“合家斋戒沐浴”<sup>⑧</sup>;九月“同春弟到曹坑祈祷观世音大士”<sup>⑨</sup>等,足见作者是一位多神信仰者。

### (三)经济活动

医者不仅以行医为业,在家庭中还经营多项产业,一方面可能是继承祖产,另一方面可能单凭行医所得诊金难以维持一家开销。目前虽尚无资料证明医者一家一年收入几何,但从他特意学习珠算<sup>⑩</sup>、清算和管理账目可知,其家中的经营活动应该能有较丰厚的收入。其经济活动主要有茶业经营、土地经营、文会放贷、养殖等项。

第一,茶业经营。婺源绿茶颇为出名,“其产茶以县城附近为中心,东北乡产量为最多,西南较次,东路以江湾、汪口,北路以清华,南路以太白,西路以许村较为集中地,后再运往他处”<sup>⑪</sup>。多在春季摘采。民国十六年四月初三至十四,12天的时间用来采茶、做茶。初三“开园做茶七斤四两”、初四“做茶九斤十二两”、初五“夜作茶八斤十两”、初六“夜做茶十四斤半”<sup>⑫</sup>等,将茶叶做好后,有专业茶商前来收购,“仁村胡亮如买茶到上坑,卖茶一百四十九斤七分,洋八十三元四角”<sup>⑬</sup>。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一至廿二,12天采茶<sup>⑭</sup>,廿八“卖桥上桥下的茶洋五十八元”<sup>⑮</sup>。两年茶业经营共获利银元141元4角。

第二,土地经营。医者家中土地较多,《日记》中描述了他自己经营土地、农田劳作的场景。如四五月份天降旱灾,四月十四至五月初十“照应田水”<sup>⑯</sup>,九月廿二至廿四,割晚禾<sup>⑰</sup>,然后与母亲舂米、晒谷,到

①《日记》,第547页。

②《日记》,第549页。

③《日记》,第589页。

④[清]程庭:《若庵集》卷五《春帆纪程》,《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2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

⑤《日记》,第505页、第557页。

⑥参见丁希勤:《古代徽州宗教信仰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⑦《日记》,第501、551、550页。

⑧《日记》,第528-529页。

⑨《日记》,第586页。

⑩《日记》,第583页。

⑪傅宏镇:《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6卷第7号,第115页。

⑫《日记》,第509页。

⑬《日记》,第512页。

⑭《日记》,第561-562页。

⑮《日记》,第563页。

⑯《日记》,第512-513页。

⑰《日记》,第531-532页。

十一月廿二以每两2元2角的价格卖与粮户<sup>①</sup>。

除自有土地外,作者还将家中土地交由佃户承种。据作者收租记录,田产分布于上洋井丘、上洋正丘、老源、汪小圩、黄兴堂、永和堂、后门圩、青山坞、羊头坞、大坞口等地,呈现分散的形态。

第三,理财。诊病、卖茶等所得,作者多将其存入上堡舅祖经营的钱会,并定年息为一分<sup>②</sup>。钱会在徽州乡村很普遍,是一种民间借贷组织,有储蓄和融资两种功能,在徽州地域社会中发挥重要的金融功能<sup>③</sup>。医者每年储蓄大洋一百元,并收取一定的利息。另外,其在村内还经营着文会,文会是一种自发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徽州民间组织,同时也是徽州一种十分重要的科举教育组织,其在明清徽州社会中普遍存在,即便科举停废,依然保有旺盛的生命力<sup>④</sup>。在徽州六县中,婺源文会数量最多,根据方志记载达76个<sup>⑤</sup>,未入史志的可能更多。文会类型有身份性文会、功能性文会,承担着振兴文教、救济贫寒、调节纠纷等责任<sup>⑥</sup>。从《日记》中看,文会可能也拥有类似钱会的功能,医者每年二月去文会放谷,十月收谷<sup>⑦</sup>,会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

第四,养殖业。养殖业对象主要是猪和鱼。猪苗来源于周边村落,如两年内医者“到王村米家买猪一对”“到中门买王自成猪二只付洋二十元”“十四到上源江买猪一对”“到仁村买猪”“到根庆买成一母猪”“初二到汪村买猪两只”<sup>⑧</sup>,共买猪11只,显然不是为自家食用需要而是经营养殖,为养猪还要去买米,如到上坑、桃源、瑶村坦、上源江等地。等猪肥后,除自家杀年猪外,其余皆出售,如“桃源林桂槐买家中猪一对,计洋五十二元”<sup>⑨</sup>。两只猪崽花费二十元,六月末买入第二年八月卖出,计价五十二元,刨去成本,利润在二十元左右。鱼塘养殖鱼苗也是医者的一种产业,自己不仅要建设鱼塘,还要处理鱼塘墙外杂物等<sup>⑩</sup>,为养鱼还要“讨鱼草”作饲料,如医者曾在民国十六年四月初五至廿一“讨鱼草”<sup>⑪</sup>。所养之鱼除了自食或送人外,还可出售,如十二月十八“卖鱼二十斤记银二元”<sup>⑫</sup>。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医者除行医外,其日常生活还有如读书、娱乐、社交、祭祀、经营等诸多重要活动。《日记》因其私密性、实时性、原始性而更显真切感与临场感,对乡村图景的认知可以弥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报告及地方志的细节缺失,而这些细节亦令我们直观感受历史现场的真实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史不仅要解释微观,更要照应宏观。《日记》所载年代(1927—1929)适逢国民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大革命北伐在1927年初来到了皖南山区。1927年4月1日,婺源县公署改为县政府,知事改称县长;7月,当地国民党党务整理委员会成立,清理本地国民党组织。但从《日记》的记载来看,似乎对国民政府的记述十分稀少,仅有一些大军过境和缴纳兵费<sup>⑬</sup>的描述,并没有构成乡村生活中具有分界意义的事件,乡村生活一如往昔,行医、生产、贸易、娱乐并未有太多变化。

①《日记》,第539页。

②《日记》,第514页。

③参见熊远报:《在互酬与储蓄之间——传统徽州“钱会”的社会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

④刘道胜:《明清徽州乡村文会与地方社会——以〈鼎元文会同志录〉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⑤据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民国多版本《婺源县志》统计而成。

⑥史五一:《明清徽州会社研究》,黄山书社,2015年。

⑦《日记》,第501、533页。

⑧《日记》,第502、520、526、541、560页。

⑨《日记》,第583页。

⑩《日记》,第585页。

⑪《日记》,第564—566页。

⑫《日记》,第598页。

⑬《日记》,第528页、第551页。



## 结 语

通过解读医者《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生活的地理空间颇为局限，活动范围狭小，很少前往县城，亦无远距离出游，这也和作者长期在乡行医有关。我们不能忽视医者职业与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切关系，反映到地域上，便出现了姻亲关系、信仰波及、乡村市场范围与日常交通路径、行医范围的多重组合，婺源医者经常行医之地正是其姻亲、好友聚集之处。从医者的实际收入看，不难发现其经济收入结构呈现出颇为复杂的来源，经营茶业、稻田、养殖业，乃至借贷收息，均是其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者的经济收入也反映了近代乡村民众经济收入的多元性，一方面所从事的职业尚未完全专业化，不具有专门工作性质，另一方面单一工种收入不足以支撑日常开销，广开财源也是现实所需。可见前现代的乡村医者，其职业化和专门化程度还远远没有发展，其实践伦理只能是乡民社会的道义伦理，而不可能形成职业伦理。有论者指出，前近代的乡村社会结构较为封闭，不外乎“十里八村”的封闭组团<sup>①</sup>。这一观点在本文的例证中得到了极好的说明。

20世纪20年代虽然发生了重大的政局变化，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各级政府的势力未能很好地深入基层，并未在乡村建立触及个人的统治网络，对日常的生境而言亦未发生冲击。婺源当地医者虽然对于外国事物有一定的了解，但并未完全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中。以往学者指出近代以来“国际市场的介入，并未对小农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反而小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sup>②</sup>，这一点确实存在，但笔者希望说明的是，由于乡村经济的相对独立，个体在商品交换网络中若处于末端，其相邻的社会网络又较闭环，那么他们的生活可能很难受到外部经济变迁的有效影响。婺源乡村医者虽行医范围窄，但诊治项目多，具有丰富的医疗经验。该医者好读书，有浓厚“儒医”色彩。对吃茶、看戏等项目的记述，则表现了其丰富的生活世界。医者虽难成境内皆知的名医，但通过交际圈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地位和良好的医名。《日记》不仅为我们生动展示了民国时期乡村医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为我们复原其活动轨迹提供了可能。

当然，无论记载的内容如何丰富，日记仅是从“我者”的角度来记录的，很少有“他者”的视角，故其选择性、随意性很大，具有局限性。日记需要与其他相关资料相互印证，从多重视角论述，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本文仅就医者日记利用、行医范围等诸问题抛砖引玉，解决史料本身的局限性问题的，唯有未来不断挖掘新资料、探索新方法。

[武汉大学杨国安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冯玉荣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康健老师均对本文写作给予很大的指导和帮助，匿名审稿专家为完善本文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谢忱！唯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李良木）

<sup>①</sup> 参见韩茂莉：《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

<sup>②</sup> 刘永华：《小农家庭、土地开发与国际茶市（1838—1901）——晚清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